

從美國劇作家奧格斯特·威爾森過世， 英國劇作家哈洛·品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談起

August Wilson, African-American playwright, Dies at 60, British Playwright Harold Pinter Win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陳正熙

Cheng-Hsi CHEN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

近來在歐美劇場界有兩件大事，一憂一喜：美國劇作家奧格斯特·威爾森（August Wilson）於今年十月二日因肝癌過去，享年六十歲，英國劇作家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則以七十五歲高齡，在一片意外聲中，被選為二〇〇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兩位不同世代，不同族群背景，不同寫作風格的劇作家，同樣著作等身，也同樣可以針對劇場存在價值或知識份子責任的議題，啟發我們的思考。

非裔美籍（African-American）的奧格斯特·威爾森於一九四五年出生於賓州匹茲堡，並在那裡度過年輕歲月。他並沒有完成高中學業，曾在軍中待過短短一年，之後並做過許多為時短暫的工作。一九六八年與他人合力創辦Black Horizon Theatre，開始他的劇場生涯。一九八四年，《Ma Rainey's Black Bottom》是他第一部在百老匯上演的作品，一九八七年則以他最為人知的作品《Fences》一舉知名於美國劇場界，之後直到二〇〇五年的《Radio Golf》，共完成十部劇作。

奧格斯特·威爾森在美國劇場界的地位，就奠基於他窮一生

之力（橫跨二十年），所完成的這十部劇作。在這十部作品中，每一部都以二十世紀的某一段十年時間（decade）為範圍，描述非裔美人在二十世紀美國的生命史，從記憶中的黑奴與南北戰爭，種族隔離與歧視，民權運動，以至於失落了種族記憶的當代族群。除了其中一部（《Ma Rainey's Black Bottom》）之外，其他九部劇作的背景，都設定在威爾森成長的賓州匹茲堡的小丘區（一個較為偏僻的區域）。時間結構的一致性，常民記憶與歷史時空的穿插交織，以至於地點的連貫性，讓這十部劇作所構成的一個世紀或連環（cycle），成為美國近代劇場史上少見的偉大工程。威爾森以不懈的努力書寫，創造出不僅是劇場史上，也是真實歷史中的一則傳奇，和其他傳奇人物如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或Malcolm X一樣，對非裔美人的歷史書寫都有重大的影響。

身為少數族裔作家，奧格斯特·威爾森的書寫歷史的努力，讓我們在面對自己的族群問題時，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本地的族群問題，雖然在以對抗為宗的力量操弄之下，已變得面目全非，理性檢視討論的空

間也蕩然無存，但不可否認地，許多關於共同歷史記憶，個人生命情境，以至於對未來想像的議題，還是具有迫切的意義，問題只在於我們願意如何面對，是繼續讓共謀的政客與傳播媒體擺佈，繼續沉淪於激情與對立的深淵，或者誠懇面對自我與彼此，以持續的關懷幫助我們趨近歷史的本然面貌，趨近人性的真實圖像，從而找到真正的希望所在，如奧格斯特·威爾森一樣，如他以冷靜凝視而非忘情嘶吼，以人情關懷而非仇恨報復，關注常民真實生命的誠懇態度一樣。

最近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從宣布到頒發的過程，似乎都不平靜，多元政治的發展，文化或文學經典標準的變異，在在考驗著瑞典皇家學院的那一群博學多聞，但不一定能跟得上時代潮流的耆老們。或許為了打破外界認為他們不食人間煙火保守封閉的刻板印象，也或許是真的希望以更貼近當代美學品味的決定向世人證明他們的開放，這幾年的選擇因此都招致不少議論，最近更引發學院成員之間公開的對立。因此，哈洛·品特的「意外」得獎，似乎也就沒有那麼讓人意外。

哈洛·品特應該算是英國當代劇作家中，比較為本地劇場所熟知的一位，一九八七年表演工作坊就曾經演出他的《*Old Times*》，最近一個演出則是二〇〇三年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的《*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和南風劇團在二〇〇五年重新推出的《*Old Times*》，至於其他在戲劇科系當中推出的課堂呈現或學期製作，就更不知有多少。

封閉的空間，日常生活的語言，人物對於不可知的威脅的恐懼，爲了要克服這樣的恐懼而加諸彼此的權力拉扯，是品特建構意義的基礎，也是我們理解作品的關鍵。在他的作品中，某種通常潛藏在體制之中，在劇場中則以神秘人物的出現具體表現的神秘力量，則是既現實又曖昧不可解的。因爲他的特殊風格而創造出來的專有詞彙「Pinteresque」（「品特般的」），確切地傳達了這種在現實表面和心理底層之間來回流竄、總讓人不寒而慄的「terror」。¹

觀眾或讀者想要對品特的作品加以政治的論述詮釋並非難事，《*The Birthday Party*》中企圖將主人翁帶走的神秘人物，可以是任何國家機器的秘密特務，

《*Betrayal*》中的婚姻與外遇，也可以被從性別政治的觀點檢視，但品特更以發表詩作、文章和演講，公開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如對於英國工黨政府與布萊爾首相的不滿，對於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強烈反對。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品特從不掩飾他的政治立場，近年來甚至宣稱他將逐漸把重心從創作轉移到實際的政治作爲，但豐富而深具啓發性的作品，已經爲他取得作爲一個藝術創作者或知識份子的公信力（credibility），另一方面，歐美社會中的理性思辯空間也還存在著，因此，即使是與他立場對立的評論者，也無法以政治攻訐否定他的作品對劇場、對社會的重要性和意義。

從品特的例子，更能夠對照出本地知識份子們的悲慘處境：在無窮無盡的對立爭論中，任何意見的陳述或觀點的辯證，都被簡化扭曲爲立場的表態，或者政治勢力的拉攏收編，不僅知識份子以專業爲基礎的公信力受到極大傷害，就連彼此之間的互信基礎都蕩然無存。個人人格、專業成就，最終都會成爲粗糙的政治運作的祭品，公理正義更無可能。

從這樣的觀點看，劇場在這

個社會的邊緣位置反而是劇場工作者的優勢，官方文化機構對於劇場的忽視，或許更是劇場工作者之福。

或許奧格斯特·威爾森的百年大業，無法完全消弭美國內部的種族爭議（如最近卡崔娜颶風所引發的爭議），或許認清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真實面貌，我們也無須賦予哈洛·品特的獲獎太大的意義，但兩個劇作家以劇場介入歷史、重新檢視現實的努力，確實值得我們身爲劇場人深刻體會與思索。

■ 註釋

- 1 英國劇評家Harold Hobson對1958年《*The Birthday Party*》演出的評論中，論及劇中主人翁無可逃避的處境時，說：「There is terror everywhere.」